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文革是谁的宿命	程晓农
【劫后反思】	文革：中国毁灭之道	王 康
【各抒己见】	文革人	冯胜平
【追根溯源】	文革三大根源——红卫兵的“文革观”影响今天中国政治	严家祺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文革是谁的宿命

• 程晓农 •

今年是文革50周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官方评价的“十年浩劫”。50年后的今天，文革不但没有被清扫进垃圾堆，反而阴风再起。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真有文革重现，但是，说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错的。其实，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诸多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内国外对文革的诸多研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话题。有感于文革不死，探讨一二，也求教于专攻文革研究的诸位。

◇ 重新认识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帮”并非祸首

关于文革的爆发，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帮”利用，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邓小平是局中人，作为文革之前的总书记，他了解毛泽东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决策，心里一清二楚。恰恰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试图尽量回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所谓“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实际上含有一种为文革辩解的企图，即毛泽东当时似乎是一时冲动，随心所欲，酿成大错，而毛泽东的一时之错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责任尽量往“四人帮”头上推，以便减轻毛泽东的罪责，这是导致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文革不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高层和省一级的文革派干部，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祸首，“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跑腿办事的帮凶。与其说是“四人帮”利用文革造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四人帮”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许多人，才完成了他发动、坚持、维护文革的个人算盘。

文革起步于文化教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仅清除了来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苏俄引进的现代共产党文明，还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则是毛的个人崇拜和盲信盲从等中国传统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这场号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远远不限于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它实际上是一场颠覆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撼动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让1亿中国人被整。在文革时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城市乡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再扩大到“黑九类”，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及群众组织武斗中的伤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还包括个人生涯被迫中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里的中学生，他们因为文革破坏了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去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而农村的中学生则绝大多数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里务农。这么多文革的受害者充当了毛泽东的文革牺牲品，在共产党国家当中确属史无前例。毫无疑问，文革的加害者绝不只是“四人帮”而已，加害者不仅包括高层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及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还包括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这种制度为文革不可避免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制度基本都是苏联模式，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发生过文化革命，只有苏联和中国出现过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在文中我特地说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但苏联的“文化革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目的是打击独立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这点与中国的文革初期的情况相似。但苏联文革仅限于让红色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并没有演变成广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另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以，苏共的文革不消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却鼓励工人农民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中共这个低素质的农民党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际上是通过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后把愚昧当作旗帜挥舞。从愚昧横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革期间的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比如跳“忠字舞”这种民间活动，其实并不是“四人帮”安排的，而是中共这个农民党治下落后政治文化的产物。

◇ 文革的本质：举国事一人

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因此，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现在关于文革的民间研究大体上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的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坦诚得到了与会各级干部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支持，但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就是他自己威信动摇、声望坠地的信号。从此，毛泽东开始大讲防范“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样的命运，死后遭到批判。毫无疑问，文革的导

火索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毛、刘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治国方针的分歧吗？倘若如此，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以被解释成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之争，似乎还有出于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还有明显的私心。

毛泽东的私心是从斯大林死后开始逐渐膨胀的，到了1957年走上顶点。他的所谓私心，就是把中国当作一块试验田，为营造他在国际共运中的世界级领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垫脚石。所谓政治垫脚石，是指中共政权的建立，证明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模式不过是把李自成和洪秀全式的造反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罢了，对东欧、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意义，因此，毛泽东还需要中国这块垫脚石在经济上拿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经济实力。以毛的简单认识，所谓经济实力，“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要能“超英赶美”，由此证明毛式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优越性。这就是大跃进的由来，大跃进时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现的两个主要“成就”便是“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

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他1957年产生的世界领袖梦直接相关。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赫鲁晓夫应对不易，而毛泽东趁机介入这两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他主张苏联不要出兵波兰，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立场矛盾，但中国的介入提升了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让苏联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谦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底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而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从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阵营当中上升到了“为首”的地位。当时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其实，毛的这些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国一旦取得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就当仁不让了。

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对当时尚且贫困落后的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灾难，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的，“为首”的代价是不断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国家计委根据矿石、设备、技术等条件制定的钢产量计划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毛泽东有统治者的苍生之念，对“为首”就应该淡然处之，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为首”的大事。然而，毛泽东被世界级领袖梦所催动，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充实他的“实力”；没有技术设备条件，就只能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中国也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最后的代价是全国饿死数千万农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大跃进的惨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个人野心；而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他决不肯从“为首”的地位上退下来，经济政策完败，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打嘴仗，争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格外恐惧，于是，毛以帝王心术策划了文革，以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中共高层内部对毛的文革动机洞若观火者，不乏其人，但无人敢冒死披逆鳞。文革期间短暂的所谓群众组织造反，不过是毛利用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临时工具而已，用完之后就弃之一旁；至于文革期间的冤魂，毛何曾有过半点怜悯。

邓小平之所以反对深入批判文革，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毛泽东命名的大跃进“副帅”，也是毛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活动的主事人，毛的严重错误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势必扯出大跃进，而批判大跃进又势必牵连到毛泽东个人野心的祸国殃民问题。无论是文革，还是大跃进，无非就是举国奉一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陷全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因为对文革的批判而把国民的认识引到这个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彻底动摇了。

试图美化文革的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其实，跳出毛为文革造势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制度层面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早于文革，那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的失败，说到底还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包括农业学大寨、五七干校等等，最后仍然归于失败。毛泽东执政28年，有18年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套，直到他死后，人民公社、国有制、计划经济才被改革铲除。如此“理想”，只不过证明了毛时代的施政逆经济规律而动而已。

◇ 文革的要害：天翻地覆谁重建？

每当人们谈到文革，往往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的确，权力斗争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但是，并非所有文革期间的权力斗争都涉及既有秩序的颠覆。文革时期的权力斗争有两类，一类是服务于颠覆原有政治秩序的权力斗争，主要是打倒刘少奇以及高层一批妨碍毛意图的官员，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各地的夺权行动也属于这一类。但是，1967到1968年各地革命委员会重建权力机构之后，高层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如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四人帮与邓小平等等，都只是毛泽东维持高层派系平衡、巩固新建秩序的手段，与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后来又陆续发生过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触及既存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严重冲击社会秩序。这第二类权力斗争明显不同于第一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文革的要害不单纯是权力斗争，而是秩序的推翻和重建。

当1966年底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造反派的冲击下陷于瘫痪，而刘少奇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时候，整个中国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造反，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已经被颠覆。此时此刻，全中国正陷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潮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个人崇拜狂潮维系了社会的“异态稳定”。那时，约束每个人行为的，当然不是法律，也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更不是服从各自单位的上级领导，而是“毛泽东伦理”，也就是当时满天飞的口号“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忠不忠”，是公众判定每个人行动是非的唯一标准。

显然，“毛泽东伦理”这个既强有力又非常脆弱的约束，可以让大众的行为不致过分混乱，但大众对“毛泽东伦理”的自发解释仍然足以制造出行政失灵和经济瘫痪。此造反派砸彼造反派的办公室，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彼造反派抢夺此造反派印小报的纸张，也同样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能裁断？这就是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的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内战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初期，毛泽东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孙悟空的角色，一棍子把天朝六部和各省巡抚衙门掀了个底朝天；但是，他其实并不英明，因为他不知道，不靠六部和各地巡抚衙门，“天下大乱”又如何自然地变成“天下大治”？所有关于文革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毛泽东1966年底时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谋划，显然，毛泽东自己对此也是懵懂的。此外，毛泽东也没有预见到，“毛泽东伦理”不但足以挑起内战，也无法制止内战。

例如，1967年7月，他在武汉试图以个人权威去压服那个得到当地部分驻军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结果铩羽而归，反而因“百万雄师”冲击毛的住处东湖宾馆，毛泽东不得不星夜逃奔上海，最后以打击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人，向军方妥协，来换取武汉局势的平定。

可以说，文革初期，当毛泽东终于通过颠覆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全社会范围的政治运动，打倒了刘少奇以及整个党政官僚系统之后，他达到了蓄谋数年的个人目的，但也造成了新的难题，那就是，造反易，重建难。究竟如何建立替代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新系统，毛泽东其实心中茫然。由于不能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转所必需的秩序，1966年底中国经济的瘫痪已经初见端倪。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来自上海的造反派，是他们替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难题。上海的文革研究者李逊在她最近出版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在1967年发动所谓的“一月革命”之后，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由造反派主导的经济和行政秩序；毛泽东从中发现了重建秩序的套路，大加赞扬，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希望各地学习。

李逊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这个文革的“上海模式”就是文革中期全国各地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样板，而全国各地的文革过程证明，真正像上海造反派那样风波不起地完成摧毁旧秩序、建立文革新秩序的，为数不多，因此，对毛泽东而言，文革的“上海模式”虽然出于偶然，却来得及时，“救了驾”，使文革免于迫在眉睫的失败，因此价值重大。第二，上海当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经济的稳定，不仅对国家财政收入、商品供应、军事技术研发等至关重要，而且，从无行政经验的上海造反派居然把上海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运转起来了，这又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文革理论的“正确”，即“大破”之后必然可以“大立”。显然，“四人帮”并不仅仅是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所造就，而是文革的“上海模式”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钟情于“四人帮”，并不单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毛泽东坚守文革的阵地，还因为上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从实践层面充填了毛泽东文革谋略的巨大空缺，否定了他们，就否定了文革，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信任，其实就是自恋的外延，他直到临死之前仍然念念在兹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名声和历史地位，而这就包含了保住“四人帮”。只是，他的失败必然地蕴含在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当中。

文革的“上海模式”充其量是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补天”之路，把被毛泽东捅破的“天”给弥合起来了。它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痼疾，一旦毛泽东死了，文革被否定，经济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文革的“上海模式”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毛泽东能维持住文革开始之后的局面，其实带有偶然性；如果上海的造反派与其他各省的造反派一样打内战，自然也就不会有“上海模式”，那么，中国从1967年开始就全面腐烂了，毛泽东的文革可能因此失败得更早、更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革祸国殃民，本来可能会更加严重，局面更难以收拾。因此，对这个为了一己之私，只知造反、不思善后的毛泽东，若给予正面评价，便是对国人和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现在还有不少崇拜毛泽东的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曲解历史，把毛泽东当作可用物件来为己所用。对红二代里的权贵来说，毛泽东是一根代表“祖上传下基业”的“权杖”，举着它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势财富永远正当；对不满现实的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则是心灵鸡汤，也是扔向权贵们的小石头；对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则是一个汤勺，用来从权贵的锅里捞一小块儿肉吃。他们当中，谁也没真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中共的红二代和官二代当中，有很多人空手起家，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他们的家族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谁真心拥护毛泽东的路线，准备发动针对自己的革命？那些

左派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却从未见其中任何人践行毛泽东的主张，承认自己属于毛所说的“最愚蠢”的“高贵者”，乃至携家带口，永住乡村务农，接受“卑贱者”的“再教育”。毛泽东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惨败，青史留骂名，而且还沦为被后人戏耍摆弄的种种工具，就连其后裔毛少将其实也是把毛泽东当个汤勺来用。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

## 【劫后反思】

### 文革：中国毁灭之道

• 王 康 •

这是该隐的黑暗，终极的黑暗，人的灵魂可能达到的绝望的极限。——〔俄〕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未来的无赖》

一

正如个人有生有死，世界也终有毁灭一天。人类这个物种的最邪恶的本事，是抢在造物主旨意前自我毁灭——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已经持续近70年，还看不出有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

二战刚结束，罗素即撰文指出，混合了神性与魔性的人类面临的危险在增大，因为慈爱与宽容正被狂热与猖獗压制；1950年他在预测人类三种未来时，把人类生命结束——也可能地球上所有生命结束——放在首位。第一个公开告诫共同毁灭危险的是辞世前的爱因斯坦，他于1955年4月11日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宣言上签名，同意人类面临普遍死亡危险的判断，被认为是来自人类最高智能的临终信息。这两名以理性和深刻著称之士对希特勒、斯大林的本质都有透彻的了解。但无论如何邪恶，德国和俄国的暴君虽然都有征服世界的目标，却不曾拥有毁灭人类的欲望、思想和能量。

没有人料到，主张仁爱恻隐、虚静无为的中国会在20世纪下半页迅速演变成一个东方利维坦怪兽，不断地刺激和挑战世界。“新中国”的主宰者几乎在掌权第一天，就大开杀戒，并在韩战、越战、中印战争中表现出对生命和平的轻蔑，在柏林危机、匈牙利事件、古巴危机等世界性危机中始终立场强硬，还不可理喻地在迫害近千万“阶级敌人”、饿死数千万同胞的同时，集全国之力，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并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公开输出暴力革命，直到文革。

纳粹德国的战争失败，让希特勒主义被永远埋葬；苏联解体，俄国若干年内不会构成世界性威胁，但21世纪并不因此太平。现在，最理性温和的人们都感受到共产党中国似乎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和难以理喻的嚣张、威摄。中国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悖论：无论崩溃还是继续崛起，世界都难以承受其后果。——这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意图：天下大乱。

二

凡可轻作结论的事件都属常态经验，重大历史则需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巨劫畸变却不易预测更难以透识和防范。文革发动已五十年，国内外，东西方，官方、学界、民间，至今莫衷一是，即显示其非同寻常的怪诞离奇。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党都在一战和大萧条后上台并得以巩固政权，中共借助日本入侵和苏联出兵东北窃取中国。俄国和德国都发生过多次数屠杀，建立起现代极权主义制度，中共在输入马列主义和斯大林制度后，更以超常速度模犁庭扫穴式地铲除中国数千年礼法人伦，又全幅拒斥西方文明，以不曾出现的规模改造中国社会和整体国民性，到1966年，已经拥有禀性异常而成熟的特性：

- 经过军事占领、经济垄断、法律虚置，建立起一个列宁党统治和斯大林制度为基础的兵营式共产政权；

- 经过不停顿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在时间上斩断中华文化道统，在空间上隔绝西方主流文化，既镇制了旧文化界又驯化了新知识界，共产党意识形态成为文化、教育和社会风尚的唯一正统；

- 以特别好斗的立场加入冷战的东方阵营，苏共20大后以更为强硬的姿态挑动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发展为“打倒帝修反”的“三个世界战略”；

- 在镇压所有“旧社会”人士后，清除党内所有“右倾势力”，开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及其同僚则进入老年阶段；

- 战后欧洲困于复兴与冷战，美国亟欲重建世界秩序而不断调整其战略轻重缓急，苏联则在非斯大林化和重新斯大林化之间左支右绌，——冷战同时消耗了俄国与美欧的元气；

所有特性中，最致命的是由于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过早出局，毛泽东垄断了中共全部话语权，其领袖地位渐臻至尊。权欲、文辞及谋略禀赋特异的毛充分膨胀其领袖空间，为1949年后所有重大变化打下一己烙印，现代个人崇拜几乎与共产政权同时在中国诞生，毛由此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中共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与合法性来源，即使犯下极为严重的罪错，也无人能够挑战其至高无上地位，从而益发癫狂，不受阻挡地走向权力巅峰，最终发动文革。

1962年初，毛泽东得出结论：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余下四年中，毛养精蓄锐、全力以赴策动文革，以影响这个时代。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终于放手启动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彻底改造中国和中国人进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文化大革命。

### 三

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其思想根源。文革固然有权力与路线之争，但其文化、哲学、价值的选择居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毛辞世30年之际，有大陆新左新毛派似乎突然开悟：毛泽东不仅不能否弃，而且需重新评价。林彪当年称毛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一出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世界历史——的顶峰。这个结论以及中南海门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启发了当代毛派的灵感，他们据此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精神为毛定位：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神圣理想；二，基督教弥赛亚救世主义（圣灵降临）；三，儒家圣人正义论；四，东方大帝国。他们试图论证，毛才是柏拉图《理想

国》中的哲人王，是人类精神统率物质并不断升进、止于至善的世界性帝王；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比历史上所有帝国都伟大（朝鲜战争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国共内战是中国的南北战争，毛式五年计划由于亿万人加入，建成独特工业化系统并释放了空前的历史首创精神，诸如此类）；毛的一生远非其他征服者、独裁者、领袖群伦的人物可比，他的思想空前改造了人类最大生命—文明共同体这一事实表明，毛不仅是“新中国的太阳”（郭沫若语），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希望。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事业前程无限。刘小枫们要作中国 21 世纪的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塔西佗，他们要见证和预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在东方崛起，并改写世界历史，他们要作这个帝国的历史学家和教父。

没有 1989 春夏之交那场血腥镇压，没有嗣后中国共产制度经由韬光养晦和全球化死里逃生并窃据相当世界经济份额，甚至没有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和反恐战争，中国毛派都不可能超越林彪而获得新的灵感。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太子党——终于脱颖而出，占据了权力要津，被毛泽东成功改造的末代子民和少不更事的犬儒新一代鬼使神差地重新呼唤和崇拜毛泽东、向往文革等无人料及的事像，更刺激了这些当代毛派的神经。薄熙来在重庆的表演——即使被王立军事件阻断——吸引了众多毛派，习近平上台则在全国范围内让毛派兴奋异常，希望剧增。

习近平三年集权，举世关注。从历史与思想的特殊关联而言，他已经以最高权力的名义，为毛泽东召魂。无论学富五车的刘小枫门徒如何渴望，若无最高权力的领衔，他们终究只是中国芜杂喧嚣的思潮之一；但没有刘小枫们的钩玄渲染，习也成不了毛二世。——只有《我的奋斗》，纳粹德国不能建立，单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就贡献了虐杀犹太人的《种族论》，取代基督教的“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以及征服波兰、俄国的德式“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

#### 四

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一党专制和共产制度已经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在宪法意义上被宗奉为中国国家哲学。从 1949 到 1966 年，毛泽东从 56 岁的壮年进入 73 岁的老年，其执政记录是一篇极端谬误而白骨累累的罪状，但他却没有丝毫反省自责，相反，毛泽东从历史和内心的精神仓库中不断梳理、提炼、选择、磨砺其思想武器，同时提拔并起用一批、一代新人，寻找最出人意表、最震慑人心、最投合中国人心性、又最见成效的形式，以将其精神、思想变成现实，并影响尽可能久远、深广的未来。

某种意义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文革乃毛泽东一个人的作品——所有其他人都是配角、牺牲品、脚手架、历史的废墟和垃圾。毛不仅是始作俑者，还是总策划、总编导、总执行，毛发动文革，属于“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的典型。历史当然不可能完全依据思虑、谋划展开，事实上，文革从启动到结束，先后发生多次变局，甚至一度危及毛本人安全。但文革始终为毛掌控，直到其死，各路反对派才捐弃前嫌发动政变。新权贵关于文革的评价与决定，是毛完全可以接受的裁夺，毛创制并赖以发动文革的基本制度，其思想、文化、精神以及历史思维、政治意识、美学符号，连同其肉身僵尸、画像、雕塑都完好无损。毛地下有知，会称心如意并作出判断：生前只是下种，死后才收获果实。

#### 五

毛用文章、诗词、书法、讲话魅惑中国人，其为害远超用枪杆子统治人民。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字游戏，是毛一生文化思想的总表达。虽然长达十年，为



祸空前，但有迹可寻，并继续毒化中国。如果不能翻检其文化，洗刷其思想，清除其流毒，中国就无法摆脱毛幽灵，跨过毛僵尸。

#### ◇ 改造国民心性

改造中国，是毛对中国的长久思考、基本判断和独特情感。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夺取、统治和改造中国就成为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标。中国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及其前程确实拥有莫大诱惑。由欧风美雨俄雪带入的近代域外文明，空前唤醒了中国的自我意识，激活了中国人的心智，中国内忧外患，却也平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蕴藏的空前契机和能量。其中最重大的变革是改造器物、制度、社会结构之后对中国文化与人心的现代改造，也是现代功利主义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最严重冒犯。

毛青年时代主持的“新民学会”，其灵感当然来自梁启超，并上溯《大学》、《尚书》等儒学经典，但毛自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判断。青年毛曾胡乱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赫胥黎天演论、叔本华生命虚空论、尼采超人哲学、博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杜威实用主义，遂断言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根本改造中国，必须从伦理和思想入手。毛不吝辞章称圣鲁迅，因为鲁迅坚信若不从心性改造中国人，一切外在社会制度的变革均属余事。而在中国搬动桌子尚需流血，改变权力、财产，掀翻中国这间铁屋子，必须血流成河，改造心性灵魂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窃据中国后，改造国民性的狂妄而荒唐的实验，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中的世界中的东方霸主，一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识、又必须经历的自我洗心革面的大改造。毛泽东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所加批语，乃其发动文革的最高宗旨，也是其一生运思的总表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 ◇ 一代新人

按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毛改造中国的夙愿已有合适尺度和轨辙，但毛有自己的特殊经验与结论。在马克思那里，农民在历史之外，不据任何首创精神；列宁出于策略考虑，将贫苦农民视作俄国为数甚寡的产业工人的同盟军；毛泽东则靠中国末代农民起义得以领导中共最后统治中国。在毛改造中国的程序中，中华民国的精英必须沦为政治贱民和社会奴隶（秦始皇就曾把山东六国贵族变为奴隶），属于消灭对象，知识界则是管制改造的头号人群，“打天下”的农民将军本性愚劣自私，不可改造，工人阶级虽被视为领导阶级，但其文化、政治、道德未必高过贫农，因此必须重新定义“人民”。集穷苦出身、士兵、青年人和毛泽东好学生于一身的雷锋，成为毛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新民”。但是，毛若不能寻求更带全局性的大规模大运动大革命的历史形式，就不能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更重要的是，毛深知，即使雷锋，也非理想的新人，必须经过一场（或数场）大风大浪式的革命运动，才能算是不仅培养模范人物，而且是锻炼和选拔新型革命者。毛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连续接见上千万全国各地红卫兵时，他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代徒子徒孙，远远超过照苏联模式遴选接班人的陈规陋习。

纳粹主义带给德国的是千年难销的罪孽，其优等民族统治世界是赤裸裸的简单邪恶。共产主义以解放人类为旗帜，却让世界血流成河。文革从手段到口号到目标都邪恶、卑鄙、齷齪、下作，却让中国人疯狂了十年。两代人过去，犬儒、乡愿、猥琐、鄙俗弥漫中国，人们竟以文革为警戒，拒斥理想主义，嘲笑正人君子，诟病英雄豪杰，诋毁圣贤天才，中国竟沦

为党棍、贪官、酷吏、无赖、市侩、小人、恶徒、骗子、流氓、痞子的乐园！即使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也非但没有削弱文革遗祸，反而加强其历史正义性与道义合法性。黄祸已在中国人内心熬炼，毛泽东败坏中国人以祸害世界的目的完全实现了。

#### ◇ 认祖秦始皇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其种族、地缘、文化、语言、思维、习性都大同小异，无论毛泽东怎么摇唇鼓舌、出语惊人，都不可能取代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世界的正统地位。毛的对策是，绕过苏联，自封为马克思的正宗弟子，但即使这样，毛也仍然身在欧洲中心的马克思主义陷阱里。秦始皇——不可能是孔夫子——成为毛的另一历史性灵感。晚年毛泽东，多次写诗谈话，称道秦始皇，最后自我总结：马克思加秦始皇。晚年毛一定意识到，即使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一代新人，未必能确保红色江山万年不坠。——相反，未来某一代宗奉马列主义，有可能一夜之间转向其所属的西方文明。文革后期，毛已无兴趣也无力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正统地而返回中国帝制传统。他一定觉察到，即使经过文革，中国人还可能发生蜕化和分裂。只有一种力量能将全体中国人牢牢控制，那就是中国2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央大一统帝国。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后救命符，直到暮年，毛念兹在兹者已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而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毛1958年为秦始皇翻案，是为1957年实行新“焚书坑儒”——反右运动——作辩护，1973年，文革后七载无心于诗词的毛写下最后一首诗，却类似献给秦始皇的投名状：祖龙虽死业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法。秦始皇的遗产，除创建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好大喜功，书同文、车同轨、九洲同风外，其“万世一系”的预言最投合孤家寡人的毛泽东。一生厚今薄古、年逾八旬的毛死前已无所顾忌，公开向49岁的秦始皇认祖归宗。此刻的毛自称无法无天，实则老命呜呼前回归一种貌似怪诞的政治实用主义：乞灵秦始皇，以保毛式政权、红色江山。

#### ◇ 人民拜物教

“民”是中国古代各家学派、尤其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马克思将解放人类的特权赋予工业无产阶级（工业化的欧洲自然成为世界中心），列宁以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俄国新的红衣主教骑士团（俄国从此优越于西欧），斯大林建立了个人独裁与秘密警察统治（退回伊凡雷帝和“第三厅”，既背叛了马克思又颠覆了列宁党），它们作为共产党权力合法性来源和现代统治方式，毛泽东照单全收。在国际共产主义谱系中，毛的独创性贡献是“人民拜物教”，以取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少数人统治和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人民军队”、“人民铁路”、“人民法院”、“人民公社”……，1949年后，毛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演变的“敌我”意识引入“人民”概念，把无产无业、无知无识、少不更事、顽劣卑贱视为“革命者”，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认同，最后形成毛的人民观。治民本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文革中毛泽东把“御民”之术推向炉火纯青。其手段是：首先分而治之，依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重新强分中国人为革命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和反动派（《公安六条》23种政治贱民、知识界、走资派），然后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吐故纳新”，并非不重要，毛直接出面教唆青年学生充当造反先锋，通过肢体和语言文字暴力留下人生与历史记忆。

1978年毛泽东发表《贺新郎·读史》，称誉中国古代最臭名昭著的恶徒盗跖，无异于公开鼓吹滥杀无辜、脍人心肝、打家劫舍、奸人妻女、暴戾恣睢、聚众成党、横行天下。暴民造反与专制统治本是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现象，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则开创了或盗取西方宗教或盲目排外的近代历史。太平天国套用基督教教条，演出的是地道中国式暴民造反的

血腥闹剧。中共把太平天国视作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毛称许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毛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东方式血腥洗脑，跟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荼毒国人如出一辙。马克思1862年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至今可作为评价文革的参考：他们的全部使命，仅仅是丑恶万状的破坏，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在梦魇中所描绘的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周恩来把与太平天国同样野蛮、愚昧、腥风血雨的义和团视作“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共同构成文革暴民造反的历史样板。太平天国之灾五十年后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后六十年是文革之祸。

文革是一百余年内中国又一次间歇式痉挛发作，毛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公开鼓动人民为非作歹的恶棍。毛的无数罪错中，最深重者是败坏人民和青年，教唆人民作恶。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罪孽滔天却难以受到审判的深层原由。人民乃民族之本、文明之本，即使曾经误入歧途，也只能由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自我觉悟。除非人民主动道歉、忏悔，否则无人能审判人民，也就无从完全否认和弃绝文革。

希特勒、斯大林都实行过“领袖崇拜”，都有狂热、虔敬的追随者，但德国和俄国人民没有被败坏。战后德国能够洗心革面、苏联和平解体的历史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仍然是传统的独裁者，人民和民族依然可以在废墟和灰烬里再生复活。权力和高龄让毛看穿人，煽动、唆使他们作恶，满足他们打家劫舍作威作福出人头地的欲望，把他们从温良恭俭让的庸人变成无所不为的造反派、革命者，成为毛自己一类无法无天的歹徒，是毛终身的理想。毛泽东以“领袖崇拜”——他已经完成——驾驭“人民拜物教”，假人民之手践踏历史、侮辱先贤、折磨无辜，戕害同类，最后为害人民自己。一旦用仇恨、暴力、权力和乌托邦狂想蒙骗人民，一旦人民被发动起来，毛就拥有翻天覆地的法力（打倒刘少奇不过区区小事）。毛泽东遗产最邪恶的成分，已融入中国人血液和心灵，深度毒化了中国人性。鲁迅笔下贫穷、愚昧、滑稽、自私、狭隘的阿Q式国民性，只是引人同情、怜悯、滑稽可笑的旧式人性，被毛泽东改造过的中国人，其狂妄、贪婪、无耻、残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权谋、虚假、奸诈，其数量之大、心性之邪痞，已经令纳粹和苏共的邪恶成员相形见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已经散播于中国，毛泽东最阴险的阳谋已经得逞。

#### ◇ 泡尔生：毁灭是最高伦理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冲口而出的三字经“要武嘛”，文革最流行的口号是“造反有理”，都与中国农民起义有关，但其现代性内涵却来自两名德国人。青年毛泽东曾对德国伦理学家泡尔森顶礼膜拜。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费希特发表《致日耳曼同胞书》，黑格尔、特莱希克、尼采、瓦格纳、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施密特等（康德除外）三代德国哲人大师都在垒筑绝对理性大厦，并把德意志帝国建在顶层。绝对理性与民族浪漫主义最终从思想和精神上催生了纳粹德国。泡尔森《伦理学原理》为德式绝对精神完成了道德阐述。《伦理学原理》之于毛，不啻醍醐灌顶。他为此书写下12000言心得，远远超过其一生读书所悟的文字。泡尔森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1.我是宇宙的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2.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不予思考与负责；3.破坏乃最高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是宇宙法则，还是最后和最高的人类伦理。它们也与中国《易经》以降求变求新求异、“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儒家心性之学相通。如果没有德国思想的输入，毛最多成为黄巢、朱元璋、洪秀全一类狂徒枭雄。不难想象，对于出身微贱、处境逼狭、老大不举的毛，泡尔森打开的是何等新颖广阔的新世界。在满清覆亡、“云横九派”的乱世，那位性格怪癖的德国伦理学大师，使“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毛看到可以一举超越全部障碍的快捷方式。下面一段毛当时的批语，正是其终身信奉的大原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先知先觉”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早已做了一段简单明了、粗鄙却率真的注解——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 ◇ 马克思：摧毁旧世界

赐给毛泽东“造反有理”现代合理性、神圣性的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几句格言体文字大开毛窍：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毛从来没有通读过马克思列宁，在读完三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社会主义论》（柯卡普）后，即速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且终身不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激进主义思潮，彻底和全部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成为压倒性选择，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正好提供了其它西方理论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马克思之于毛，比泡尔森更进一步，从历史哲学、世界观赋予暴力造反、阶级斗争、独裁专政以“科学”的合法正义性，成为文革“大破大立”，“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口号的世界性根据。马克思的深层隐秘，毛不一定知晓，但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里已经领会到这名读神者的信息：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那时我将如神一般，在暴风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将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无疑，在马克思那里，毛出人头地的人生愿望得到空前的鼓励和启示。毛以自己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无论多么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的皈依。

信奉毁灭，视人命为草芥，是中外暴君的共同道德。如毛一样对仇恨、杀戮、毁灭抱有狂热兴趣且视若神圣的人物，史所罕见。毛使自己成为中西古今破坏力量和毁灭意欲的集大成者，源于他的毁灭伦理观，如此才可理解毛对不幸、苦难、死亡为何持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超然姿态，才可解读毛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狂词浪句诸如“感谢日本皇君侵略中国”、“中国人死掉三亿也……”、“搅得周天寒澈”……才可明白毛何故全然不顾及几十年追随抬举卖命的同侪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的颜面死活，不顾及百万右派人士家破人亡、几千万农民无端成饿殍、上亿中国人斗得死去活来的惨状，才可理喻毛为何绝不施仁政，绝不行宪政，绝不下罪己诏。——非但如此，毛在中国人大规模生命倾覆的血腥味中，分明产生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与欣悦。

#### ◇ 列宁斯大林：毛的父亲和导师

1922年，垂危中的列宁几乎一念之间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以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球苏维埃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宿命般地进入俄国革命之谷。按毛式思维，马克思为中共奠定了世界历史观和社会改造理论，列宁、斯大林则把造反、革命、破坏、毁灭变成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并发展出新型统治术和治理模式：一个职业革命家队伍组成的党，这个党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军事共产主义的铁血管理，必要的战略退却（新经济政策），全盘集体化，指令性统制经济（五年计划），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政治清洗、永久性集中营，……最重要的是几条基本原则：意识形态至上，一刻也不能松懈对俄国人民的思想钳制和灌输；一党专制，决不容许任何挑战；实行警察统治，废止法治；个人独裁。须臾不可离的是，必须保持钢铁般的冷酷，花岗石般的意志，不断开动绞肉机，扭紧恐怖统治的发条。毛曾饱受莫斯科的羞辱与冷遇，1949—50朝觐莫斯科期间，一度面临惨遭废黜的窘境，他却只敢在斯大林死后私下抱怨。列宁是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象征，毛称斯大林是父亲和导师。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列宁斯大林，他的江山只是海市蜃楼。再屈辱，也需公开声明向苏联“一边倒”，“一切服从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把毛的罪错的一半，算在列宁斯大林身上，不是为毛开脱。1949年后毛的所有举措，列宁斯大林几乎都实行过，毛并没有僭越。称毛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好学生，毛当之无愧。从马克思到列宁，一个现代准宗教世界得以诞生。《共产党宣言》即其《圣经》，共产主义即其天堂，马克思即其救世主，无产阶级即其选民，莫斯科即其耶路撒冷，资产阶级即其撒旦，所有不遵循马列正统者即其异端，需极刑处死，暴力、恐惧、专政、战争即其手段。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宇宙观轻而易举取代中国古老浮泛的天下主义。列宁需要东方信徒，第三国际需要支那支部，《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需要中国读者。毛泽东们更需要权力合法性，只有苏联模式才能满足毛的理想，——有朝一日，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

#### ◇ 殃及世界，亵渎理想

“打倒帝修反”是文革狂热口号之一，今人殊难理喻，却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国际战略，是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思想以及“人民拜物教”的国际化 and 将来形式。文革在东西方都曾引发关注，并产生直接影响。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等亚洲共产党，印度“砸烂雕像运动”、秘鲁“光辉道路”、日本“赤军”、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德国“红卫军”、意大利“红色旅”、美国“黑豹党”，都从毛泽东和中国文革受到启发，甚至直接获得武器、资金和人员援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大屠杀，把一个佛教国度变成人间地狱，则是毛泽东文革在国外的典型样板。

中国毛派领袖张宏良去年声称，“5·16”通知比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都伟大，文革将在21世纪成为大众民主政治的先声。这种痴人说梦的言论并非毫无来由，文革调动的是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敌意，投合人们迅速改变处境的愿望。相对于温和、理性、渐进、改良，造反、革命、破坏、毁灭更能激发人类的狂热、浪漫、残忍和盗贼气概。毛泽东思想及其文革决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无论口号、目标、手段、结果、影响，文革都诉诸于人类天性中的仇恨、谵狂、偏执、愚昧、野蛮、破坏性、嗜杀欲，它们只是毛泽东实现一己私欲的工具，充满血腥、暴戾、虚伪、兽性，它们以为真理、正义、公平和未来献身为幌子，只是满足毛泽东最强烈的个人欲望：统治世界。——这是最大的不义和诈骗，毫无任何正面意义。

此外，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暴民统治，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以及杨朱“贵我”、韩非、李斯、商鞅等法家以及三国张鲁五斗米教等杂七乱八的东西，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毛泽东头脑和文革中。

#### ◇ 敌基督

毛属于犹太教的“敌基督”，是被神选定，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为一身的救世主的对立面。中国有“暴君”、“独夫民贼”，但没有“敌基督”概念。使徒约翰指出，“敌基督”是“基督”诞生后的将来人物，他的阴险邪恶、残酷不仁都超过前人，他存心以与耶稣相反的方式——仇恨、欺骗、杀戮、暴力、毁灭——统治世界并有力量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按此标准，只有20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够“敌基督”，而毛泽东比他们更接近“敌基督”。毛表达其政治理想的个人工具是格律诗词。文革前，毛已再三企盼：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小小寰球……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人类就是在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希特勒、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屠杀的生命，毛在数量上已超过其总和；因为中国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军事水平的局限，毛在有生之年不能发动希特勒式的战争，但毛对战争的狂热

和痴迷，犹胜希特勒。斯大林、希特勒都没有接班人，更没有整个国家继承其事业，毛却拥有令人恐惧的亿万追随者以及一套毁灭中国继而恶性改变世界的思想遗产。

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性原则、怀疑精神和批判哲学遭遇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演化成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严重损毁了欧洲古典主义和基督教，造就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两大极权主义。基督教几个核心观念诸如天国即将来临的末世论、弥赛亚救世主义、选民优越性、最后审判，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民粹主义、共产极权主义，最后彻底滑向其反题，不仅激活了秦始皇大一统帝国宿梦，而且引入现代人类最大的“敌基督”——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华红色帝国法统。中国1949年以后的灾祸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恶而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也不只是西方一俄国现代极权主义，而是两种恶力在中国联手结盟的集大成后果。中国儒学与基督教成全人类、救赎世界的神圣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对于中国，“敌基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传统中国，与圣贤、君子、豪杰、大丈夫相对应的是暴君、小人、懦夫、乡愿，善恶标准出于道德裁决。《圣经》显示，使徒约翰最早发出“敌基督”将会出现的警告。按照基督教，凡是伪称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弥赛亚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敌人。在约翰两封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里，“敌基督者”以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出现。敌基督是耶稣的反面，耶稣极端仁爱，敌基督极端邪恶；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敌基督是龙、兽、假先知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耶稣从天父得到权柄，敌基督从撒旦获得权柄；耶稣基督以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的为使命，敌基督以陷人类于大灾难为目的。敌基督是人类罪恶势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现成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象征。“敌基督”是分析、判断20世纪几大暴君最合适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审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全部表演，不是通常的独裁者、暴君所能为，而只能出自一个难以理喻的怪物，即与耶稣孔子争夺世界的撒旦魔鬼——敌基督。顺便提一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属蛇（龙），都是中共领袖，都是敌基督的化身——红龙。

## 六

核武器毁灭力量的提升，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要求重审一切价值。只有促进人类彼此了解、对话、交流、融通，倡导仁爱、怜悯、同情、理性和中庸的思想，才可把世界引向未来。任何极端思想、偏执教条和激进主义都将导致冲突和对抗，降低人类的精神，败坏世界的道德，走向同归于尽。毛泽东及其文革是20世纪人类心智迷狂的显例，“敌基督”丧心病狂的表演，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不应有它们存在的余地。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20年从《新约·哥林多后书》发现某种神授权威，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超自然能力和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韦伯预见到某种与基督教基本教义相对的“奇里斯玛”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征，拥有特殊的魅惑力和感召力，同时拥有庞大、狂热、盲目服从的信众。同传统型统治相比，个人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其权威与打破传统、挑战现存秩序的程度成正比，并导致一种新的观念系统、行为标准、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产生。“奇里斯玛”就是“敌基督”，绝对的独裁者，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不受任何制约，并不断寻找和制造新的攻击目标，清除任何可能觊觎自己权力的人。敢于、能够挑战“奇里斯玛”统治者的只有两类人：智者和圣徒。中国为数不多的智者在文革前已几乎被消灭殆尽，文革是毛泽东极端邪恶和绝对独裁统治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圣徒诞生的年代：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

九莲、陆鸿恩……可叹的是，中国没有出现直接挑战和消灭毛泽东的荆轲式英雄。而德国谋刺希特勒的人士却高达七千余人，包括三名德国元帅和众多知名人士，其中最杰出的是施道芬堡伯爵和朋霍费尔牧师。

1989年后，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开始浮出，时隐时现的“奇里斯玛”型人物偶露尊容，阴差阳错地坐拥巨量财富又危机四伏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又重新乞灵于毛。到2016年文革发动50周年，中国各界呼唤二次文革、为毛泽东招魂，已成公开且可称嚣张燎原之势。50年过去，由于中共成功得遮蔽了文革的真相，继续保持对毛泽东的尊崇，数以亿计的当代青年对文革的陌生、神秘、好奇随时可能转化成又一场史无前例的狂热造反，以发泄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愤懑，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切将玉石俱焚，一切又从头开始。毛泽东再次君临中国，并非危言耸听。

整个20世纪，欧美世界、俄国和中国人自己，都低估了中国历史文化里的专制黑暗和原始兽性与现代西方有害思想遇合后的巨大破坏力，都忽视了中华帝国在其现代命运中死灰复燃的可能性，都不曾意识到，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东西方有害思想的现代渊薮，毛泽东乃是奇里斯玛式的敌基督，文革乃是世界启示录式毁灭的序幕。

## 七. 小结：

一，与新左新毛派不同，我把毛泽东归为“敌基督”，他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哲人王”。毛泽东及其文革，是中国历史的大失败，文明的总崩溃，是中国人共同的奇耻大辱，是东西方有害思想古怪麇聚的史无前例的恶果，是孔孟到顾炎武、曾国藩等无数前贤往哲忧心如焚的“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相食”的“亡天下”惨祸。

二，毛泽东及其文革遗产，是古今中外有害思想毒化中国的集大成表演，竟逃脱了清理和审判。文革思想一旦与中国“改革开放”获取的经济成就和物质力量合二为一——即承认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同为合理合法，就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意识与世界文明草创时期，彻底毁灭中国，同时祸害世界。

三，习近平等太子党归宗认祖毛泽东，不仅是对毛泽东统治及文革时期中国人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最严重的亵渎，而且是拿全体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和未来作赌注，是走向毁灭的选择。制止毛泽东东山再起，阻截文革借尸还魂，是经历过文革终于认清其本质。

2016，5，30 北美 结庐

~~~~~

【各抒己见】

文革人

• 冯胜平 •

◇ 引言

30年前，笔者在博士论文《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中写道：“文革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丧失，今天的中国……既不属于

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

当时我认为：“文革刚刚结束，人们还来不及为它写史，它对未来的影响也还没有充分展示。”

1. 文革是暴民政治的经典范例

30年过去了，今天有关文革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如果说1986年谈文革的影响还为时太早，现在则已正当其时。浩劫之后，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灾难，它对未来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通常要很久以后才会显示。

温德尔·菲利普斯名言：“革命不是制造的；它们来临。”（Revolutions are not made, they come.）文革也不例外。但文革并非从天而降，它来自亿万中国人的心灵。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的心灵，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没有人民支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发动一场如此规模的革命。罪恶之源——如果文革是罪恶——在人们心中。毛泽东给了文革第一推动，人民使它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文革是研究暴民政治的经典范例。随着群众专政代替国家警察，“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任何忠实的公民，只要还有“良知”，都必须成为政府的鹰犬。这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邻居斗争邻居，妻子揭发丈夫，朋友出卖朋友，子女检举父母。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亿万人被迫害。从未有一个民族的道德如此沦丧，人类的尊严从未被如此践踏。然而最具讽刺的是，中国人从未如此自豪过，他们从未像在文革中那样确信，人间天堂已在中国实现。

借用奥斯卡·瓦尔德的一个比喻：世界上有三种暴君，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君主（Prince），教皇（Pope），人民（People）。君主统治人的肉体，教皇控制人的灵魂，人民则对两者同时施暴。相比之下，第三个暴君最为残酷，也最难以抗拒。君主的暴政与其生命同在，可以终止于革命或暗杀；教皇的暴政取决于信徒的虔诚和信仰，一念之间即可颠覆；人民的暴政则从定义上就是不可战胜的，它与人民共存亡。

对许多人来说，文革曾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只是在所有人——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工人、军人和农民——都被运动耗竭之后，文革的火焰才熄灭。事实上，许多相互冲突的团体都曾支持过文革，直到其本身成为运动的目标。自己被践踏，又去践踏别人，人们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样相互燃烧。如果说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顶峰，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是它的谷底，转折点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回顾文革，人们看不见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红卫兵还是走资派，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施害者还是被害者，最终都被抛入地狱。没有人——即使毛泽东本人——是胜利者，所有人都失败了。文革是一部真正的“人肉搅拌机”，功能举世无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反思文革成为时髦。什么是反思？反思就是想一自己的责任，为以往的过错忏悔。遗憾的是，忏悔这个词对中国人太陌生；他们更喜欢追究别人的责任。于是祈祷沦为传销，道歉变成做秀，许多文革亲历者的反思，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控诉。

2.文革人

除去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悲剧表现。作为马克思和秦始皇的传人，毛一生好斗：与天斗，搞大跃进；与地斗，搞人民公社；与人斗，搞阶级斗争。在斗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敌之后，毛最后与上帝斗，发动文革，欲与天公试比高，要改造人性，创造一代雷锋式的、无私无欲的共产主义新人。

不满意上帝创造的旧人，毛泽东以中国为舞台，八亿人为试验品（白老鼠），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造人性的社会实验。实验失败，新人没有造成，旧人又回不去，成就了一代文革人。文革人的特征是：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无君无父，天地不敬，神鬼不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文革人不畏天谴，也不怕灵魂下地狱。

文革人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却是文革的结果。文革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但的确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全民的疯狂和苦难为代价，它付清了一笔历史的孽债。

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更不会有今天的宪政思考。那个时代的人是相信专政的，他们崇拜毛泽东，迷信“大救星”。毛泽东不做一回神，中国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

文革解放了思想，锻炼了群众。文革之后的中国人再也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文革之后的中国再也无法回到原态。无论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还是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统统不再灵验。毛泽东把中国的根给挖了。

一个世纪前，罗素访问中国，对中国人的驯顺认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笔下，中国人贪婪，怯懦，冷漠。文革后的中国人，一样的贪婪，怯懦，冷漠，却不再驯顺认命。一场触及灵魂的洗礼，文革清除了国人骨髓深处的奴性。

拿破仑临终前曾说：东方有一头沉睡的雄狮，谢天谢地让它继续睡吧。这头雄狮就是中国。它在鸦片战争时没醒，甲午战争时没醒，抗日战争时也没醒，却在文革中醒了。

文革结束了迷信，改革创造了机会，开放提供了舞台。有限的自由，无限的贪婪，道德的崩溃，成功的渴望，像原子聚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国轰出了传统的历史轨道。

改革开放是人性的复苏，也是党性的覆灭。一生一死之间，孕育着一个新中国。

这，也许就是文革长远的历史意义。

3.病毒 VS 宪政

1979—2013年，中国GDP年增长9.8%，35年增长26倍，同时期美国增长约2倍。什么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秦晖的答案是“低人权优势”，林毅夫的解释是“后发优势”。说的都有道理。没有解释的是，世界上有的是后发国家，也不乏低人权地区，为什么它们的经济没有发展？

更能解释中国奇迹的，是“病毒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含辛茹苦，不择手段，实现了中国经济起飞。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

再无信仰。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闹出多大的动静，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就在这片信仰的废墟上，“中国病毒”应运而生。

在中国，腐败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促进经济，而且迎合人性。“中国病毒”的核心是腐败，它迎合并把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对世界形成了一种另类威胁。过去人们总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靠的是低人权优势，其实它更大的优势是低道德优势。它透支的不仅是环境和未来，更是灵魂和良知。树若无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在崛起的背后，是肆无忌惮的盗版，举国风行的造假，创意迭出的骗术，不择手段的手段。别人花费巨资研发的产品，我们随意笑纳；别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我们照单全收。这样的国家不发展，什么国家发展？这样的人不成功，什么人成功？

“中国病毒”是文革后中国土地上产生的一个毒瘤。毒瘤没有主义，没有信仰，也没有价值观。“中国病毒”很多方面像癌症，但又不是癌症；癌症不传染，病毒传染。在观念上，“中国病毒”与共产主义理念格格不入；它是中国共产主义墓地上长出一束罂粟。

面对“中国病毒”，西方束手无策。随着价值观的解体，西方社会正在丧失免疫力，任“中国病毒”肆意入侵。

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病毒”。对急于摆脱贫穷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发展模式比中国模式更诱人。

成吉思汗用骑兵征服世界；英国用炮舰征服世界；美国用普世价值征服世界；中国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如萨斯，人类还没有找到防御它的疫苗。

与“中国病毒”相对的另一前景，是宪政民主。文革之后，除了金钱和权力，中国人再无偶像。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芦笛），“全面溃败”（孙立平），“小时代”（郭敬明），是当前社会的最好写照。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彭真等中共老干部在文革后制定《82宪法》，强调保护公民权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习王反腐，官不聊生。一夜之间，中国官员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的宪政铺平了道路。仅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还需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获得更大公约数，成为共识。

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任务就是消除不公。贫穷和不公，历来是中国社会革命动荡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结束王朝循环，走向宪政。

文革50年之后，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在宪政和病毒之间做出选择。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病毒的路上铺满鲜花。面临天堂的考验和地狱的诱惑，中国不是从宪政中走出，就是被病毒吞噬。何去何从，是新一代中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4.阿Q不再革命，闰土不再认命

宪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通过文革从负面溶入国人的血液。企业界的朋友常常向我诉苦，说他们不喜欢雇佣大陆人，因为他们缺乏位置感，太折腾。

文革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妇女能顶半边天”；“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前一个口号解放了一半中国人，后一个口号解放了所有中国人。继承文革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传统，中国今天新新人类的口号是：“我的XX我做主！”

文革之后，阿Q不再革命，闰土不再认命。三亿农民进城，不再回未庄；他们要做人，做城里人。

刁民阿Q告别革命，开始讨论宪政；顺民闰土打起领带，立志要做马云。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刘永好、史玉柱不也出身农民吗？他们能成功，阿Q、闰土为什么不能？传统社会只允许少数人——刘邦、项羽、朱元璋、毛泽东——做梦；今天则是人人有梦，都想做世界的主人。

文革之前，中国人曾相信，贫穷不仅光荣，而且正义。那个时代的最光荣的家世，是三代贫农。疯狂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百年来中国革命不断，宪政不成，根本原因就是有太多的贫农。

资本是诚实的；不诚实的是人。革命家马克思断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鲜血。生活窘迫的革命导师向朋友借贷，从不赖帐，坚决不还，屡屡被债主逼债，一度遭房东驱赶。他对资本的仇恨，即出自理性思考，也不乏情感宣泄。反之，资本家巴菲特大胆投资，诚实做人，创造了数百亿财富，再将其全数回馈社会。前者的革命理论使亿万人死于非命，后者的资本积累改善了亿万人的生活。孰优孰劣，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论证。

文革之后，强人政治结束，常人政治开始。具体表现是海外民运的衰落和国内普遍的政治冷感。不久前参观一个文革图片展，见到的几乎全是民运人士，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6·4后曾拥有数千成员的“民联”、“民阵”，如今各自只剩下寥寥数十人。纽约地区有百万华侨，数万大陆留学生，但在广为宣传的文革图片展和随后几天的研讨会上，几乎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年轻人不关心政治，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文革在国内成为遗老遗少关心的前朝往事，民运在海外后继无人，正是中国的希望。

5.官方为什么不反思文革？

马晓力提出反思文革，罗点点问她准备好了吗？问答之间，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洞察力。天真的马晓力以为，反思之后，中共就能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长期执政；罗点点显然比她看得远，她知道中共积怨太深，经不起反思的折腾。有些债还不起，有些罪不能宽恕，有些事无法反思。罗点点的问题其实很清楚：如果反思的结果是执政党下台，作为红二代的你（马晓力）真的准备好了吗？

即使是一代伟人华盛顿，也曾面临偿还不起的债务，不敢反思。这里讲的不是经济，是政治。美国革命后保留奴隶制；屠杀印第安人；镇压谢司起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没有选举权；强迫保皇派向新政权宣誓效忠，拒绝者涂柏油插鸡毛游街示众然后驱除出境。目睹所有这一切，当时激进民主派代表托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也曾要求反思。他们抨击政府，鼓吹“二次革命”，其做法与中国今天政治反对派如出一辙。为摆脱窘境，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修宪，废奴，普选，善待印第安人。在积攒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之后，华盛顿的后人帮他偿清了债务。

公司资不抵债却不想赖帐，唯一的方法是破产重组；政府信用破产却不想下台，唯一的手段是政治改革。

6.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

文革50年后，中国左派崛起，开始怀念文革。他们拒绝“普世价值”，对美国持敌意态度，从社会腐败现状中看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对这一类人物及其观点，中国右派称之为“脑残”，“文革回潮”。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公诉茅于軾事件、毕福剑事件、5·2红歌会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涂炭亿万生灵。

那些坚持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泽东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注定见仁见智，不必也不能强求。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既有“毛左”，必有“民右”。左脑无需反对右脑，人无分左右，都有表达思想和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

今天社会上的左右之争，基本上是一场文革人之间的战争。文革人是党文化的叛逆者，也是党文化的继承人。他们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用毛泽东的语言批判毛泽东，即使反共，身上也带有党文化的胎记。文革人分两派，左边一群叫“毛左”，右边一群叫“民右”。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歌颂文革，右派诅咒文革；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都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人道底线，两派表现又惊人的相似：政府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当局抓薄熙来，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毛左”还是“民右”，似乎都不想结束专制制度，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没有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人老了。一些人怀念过去，在广场舞中找到当年跳忠字舞时的感觉；另一些自甘堕落，学会了敲诈勒索。对后者时而上演的碰瓷游戏，年轻人戏谑地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7.“那个胖胖是谁？”

作为党文化的产物，文革人即将退出政治舞台。那些继续表演的，将成为历史的笑料。我们已经清理了场地，再不退场，自己也会变成垃圾。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文革人已经完成了破坏旧世界的任务，建立新世界的使命，应该由一代新人去完成。

历史有时需要铭记，有时需要遗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革命家的煽情。其实，即使是革命者自己，在革命成功以后，往往也希望人们忘记他们过去的承诺，向钱看，不找后账。

曾有人说，普遍的政治迫害会产生一种政治智慧，从而为结束暴政创造条件。事实恰恰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会使结束暴政更加困难。因为归根结底，极权制度的力量不在于它抗拒变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变那些试图改变它的人的能力。长期在黑暗中生活，最后也变成阴影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中国三千年噩梦的使命，只能由新一代人来完成。这些人没喝过狼奶，不擅长阶级斗争。与文革人不一样，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未受过迫害。

韩寒、郭敬明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他们拒绝党文化——不与中共为伍，也不与中共为敌。玩自己的游戏，讲自己的语言，他们表面上不问政治，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我们关心政治，他们热爱生活；我们相信民主不是赐予的，必须争取，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无需强求；我们在《小时代》《欢乐颂》中看到堕落，他们从中得到升华。我热衷研究党史，写书贬褒毛泽东功过。儿子问我：“那个胖胖是谁？”朋友的女儿看完“九·三”大阅兵，留下轻轻一句话：“他们好傻哟！”

如果我们还不是太傻，就应该知道：历史已经翻篇，新一代已经不跟我们玩了。

（2016年5月16日于普林斯顿）

~~~~~

## 【追根溯源】

文革三大根源——红卫兵的“文革观”影响今天中国政治

• 严家祺 •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我们今天谈论文革，就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谈论清朝末年的事情一样。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人，可以回想一下，在年轻时，当时谁对清朝末年的事感兴趣？应当说，除了历史学家外，当时没有多少人关注、谈论五十年前的往事，原因是，大清王朝早已灭亡，在大清王朝后，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时期。就是共产党，也不关注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而把打击的目标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五十年后还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于文化大革命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很大影响。怎样看待、评价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毛泽东，还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对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文化大革命一词，直接与文化、与革命相联系，但实际上，这是一场践踏、摧毁文化的运动，由于把中国城市、农村几乎大多数人卷入了进去，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在文革中独特的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谈他独特的体验，所以，就是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谈起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众说纷纭。

#### ◇ “文革经历”影响“文革观”

经历文革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在文革中受整的“当权派”、专家学者名人；二是大学、中学红卫兵；三是所谓“造反派”；四是所谓“保守派”；五是不大参与文革的“逍遥派”；六是备受歧视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造反派”、“保守派”是文革时期的称呼，今天谈论“造反派”、“保守派”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分类有重叠交叉，有的“保守派”后来成了“造反派”或“逍遥派”，有的“造反派”在文革中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迫害。但这一分类，研究当时的“红卫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评价文化大革命，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小平属于第一类，他对文革没有好感，但他没有追根溯源，他的“文革观”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关文革的决定上。

李慎之、遇罗克、刘宾雁、王蒙属于第六类。

胡锦涛、温家宝不是“大学红卫兵”，但他们的文革经历，与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有联系，或受当时大学、北京文革较大较深的影响，可以把他们归入第二类、第五类交叉。他们下台了，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可以不管他们。习近平在文革爆发时十三岁，在今天，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他们如何看待、评价文革，如何全面评价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

#### ◇ 老红卫兵最早提出“反专制”

一九六六年北京成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因父辈受到文革冲击、带有血统论倾向、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组织，然而，又是文革中最早在他们文件中提出反对专制政治的组织。一九六七年元旦，联动的《中发秘字〇〇三号》，明确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这一《〇〇三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动成员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虽然《〇〇三号》文件并不一定反映联动许多成员的思想，但正是这一文件，在文革中第一次把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专制制度”。当时习近平比他们只小三、四岁，由于他父亲习仲勋早已被打倒，习近平不可能参加当时联动的各种活动，也不会形成中国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思想。应当说，红卫兵一代思想的主流是崇拜毛泽东，维护专制制度，“反对专制制度”只是红卫兵中的一个微小的支流。

在文革五十年的今天，参与或被卷入文革的许多人，都在大谈文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造反、批斗、抄家、关押、武斗、军管、五七干校，文革图像使今天年轻一代眼花缭乱。在邓小平文革后掌握大权、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后，在文革结束后四十年，“老干部”的子女一代，其中不少人成了中国今天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像薄熙来这样在文革中遭难的人，面对文革后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也没有完全接受邓小平的“文革观”，在行动上部分肯定文革，拿一些没有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私人企业家来开刀，以满足中国传统中根深柢固“均贫富”的理想。

◇ 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卷入人数最多的政治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灾难。文革有三大根源：

第一，文革是中国几千王朝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强化皇权现象。中国的王朝政治传统根深柢固，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经过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大陆，王朝政治传统在文革中明显复活。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一九四九年还带有某些“共和”色彩的“人民共和国”，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成了“红色王朝”的帝王或皇帝。毛泽东打倒刘邓陶、清除“彭罗陆杨”、有意废除林彪的“皇位继承权”，都是中国几千年王朝政治中司空见惯的“杀戮功臣”、“强化皇权”现象。

第二，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次全民运动。

与中国历代帝王不同的是，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毛泽东没有完全按马克思的说教去做，但毛泽东依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信徒。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的各项政策，从没收地主土地、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五七干校”，都是为了实现他“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这种空想，又同中国传统“均贫富”理想相结合，把那些不满共产党特权的“造反派”当作他清除政敌的工具，于是形成了广泛的民众运动。

第三，文革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与唐宋元明清时代有两个不同，一是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公有化运动，使中国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来源被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公社所束缚，人民从根本上失去了个人权利，就是“造反”，也只能按“最高指示”办；二是二十世纪以来，广播、报纸、火车、汽车和交通的发展，使中国全国各地互相呼应。在唐宋元明清时代，全国“大串联”是不可能发生的，大串联和通讯的发展把全中国政治连成一片。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的全貌可以看得清楚了。今天的中国，政治上仍然是“老红卫兵”在近五十年前发表的《〇〇三号》文件中指出的“专制制度”，而经济上，已经走上了两极分化严重、没有民主法治的“旧式资本主义”道路。要改造中国，走毛泽东农民革命的道路和薄熙来部分肯定“文革”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今天中国的“专制政治”加“旧资本主义”的弊病，只有用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来解决。

□ 原载《争鸣》月刊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